



孔子文化奖
学术精粹丛书

安乐哲卷

杨朝明◎主编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孔子文化奖
学术精粹丛书

安乐哲卷

杨朝明◎主编 田辰山◎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安乐哲卷 / 杨朝明主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80-8578-4

I. ①孔… II. ①杨…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7067 号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安乐哲卷

主 编 杨朝明

编 选 田辰山

责任编辑 董秀娟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27.25

字 数 415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编委会

顾问◎马平昌 梅永红

策划◎傅明先 吴霁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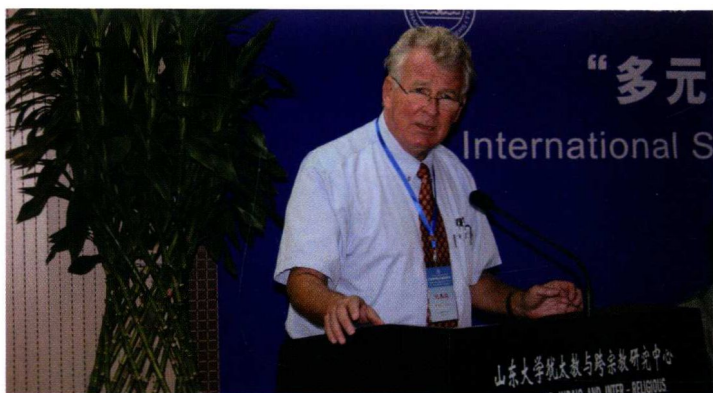
主任◎李大友 杨朝明

委员◎刘续兵 田辰山 冯建国 段海宝 王正

主编◎杨朝明



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暨 2013 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典礼现场



安乐哲先生出席山东大学建校 110 周年庆典



出席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和学生们在一起



2013 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辞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安乐哲

他是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汉学家，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他钟情于东方文化，倾心于中国哲学，涵泳于儒道各家，贯通古今中西，举手投足间尽显谦谦君子风范。

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推广中国典籍，翻译了《论语》《老子》《中庸》《孙子兵法》等多部经典，他对中华元典的新诠释、新解读，成就非凡，独步当代，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他尊重孔子，精通儒学，他将儒学与西方文化进行对等、互动式研究。他深入孔子的思想世界，追本溯源，深剖精析，总结儒家文化特征。他提出“儒家角色伦理学”“儒家民主主义”等新理论，对儒学做出创造性阐释。他积极探讨中国儒学的现代价值，为谋求多元文化共存互动而努力。

他主张会通中西，全面诠释中国哲学的内涵，构建了独到的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论体系，消解了以往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一些误读与隔阂，为中西哲学的互相理解与深层对话开辟了新的道路。

他致力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周游世界，讲学不辍，广泛联合中西方学者展开对话，参与主持“世界文明论坛”，主讲“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以其个人的学术魅力构架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他好学深思，真积力久，以其丰富的著述、精深的见解，驰骋学坛，享誉全球，为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与中西哲学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



获奖感言

今年，世界儒学大会把殊荣独特的“孔子文化奖”颁发给我，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与许多同道，献身于孔子儒学的传统历史与当代价值，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项大奖再高荣誉。

在学术圈内，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获得同行承认价值更高的礼品了；没有比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有限的奉献，却换来如此巨大的慷慨，使我感到更需要谦卑的了。

其实，这个大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是儒家思想教导我们的，与人的关系是首位的；我们存在，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以个体，而是以与他人不分的关系！

所以，我接受这份殊荣，代表许多人；我个人的生命，也带有他们的生命。他们曾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曾造就我的生命；很多很多年，他们是我本人美好故事的主人。我们每向前走一步，我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身处一个与许多其他人不分的场。

首先，他们——我的恩师：刘殿爵、杨有熊、劳思光、唐君毅、方东美和葛瑞汉，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曾做出值得这份殊荣的贡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我接受这份殊荣，还代表很多世界级的学术同仁与前辈。与他们，我享受非凡情趣的友谊与情感，我自己多年探寻的志同道合。其中已有数位几年前就已经获得这一殊荣：庞朴、汤一介、杜维明和牟钟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我接受这份殊荣，还要代表我满腹才华的学生们。多年来，他们教了我很多。学生的日显头角，也为他们老师赢得成功、自豪和卓越。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人是人的关系造就而成，这是孔子哲学一个根本思想。一直与启迪精神的人群同处，这样度过生命的诸多年华，我感到自己有很大福分。想起 20 世纪 60 年代，十八岁的我踏上香港的土地，机会就那样开始：我在这个称作“大中华”之地的一些最有声望的学府，先是做学生，然后做起先生；开始是香港和台湾，后来则是全中国各地的许多大学。

在中国大学谋面的教授与学生，构成我学术的家庭。人之造就而成，实为“合多而一”，天事人事皆为“一多不分”；这是我从儒家哲学获得的两个深刻启示——接受孔子文化奖的殊荣，我要代表的就是这个学术家庭，我是作为它的延续。我自己，将把孔子文化奖视作无穷无尽的激励与动力源泉，持久流淌。我将竭尽全力做这个家庭代表，不辜负这份厚重的荣誉。

我们处在重要转折时代。中国仅用一代人时间，便奇迹般崛起，确实令人刮目；我们正目睹，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在发生重大转变。世界文化秩序也会变吗？中国文化是不是也将改变世界？

数十年间，中国国内，几乎每所重要大学校园，都悄然出现国学院。在国际上，四百多孔子学院已遍布世界各地；仅在美国，就多达九十余所。今天的世界需要儒家的传统智慧和价值；注重家庭、和谐、道德，是作为人、社会、国家关系不可缺少的生长条件，它有利于建设世界的新兴文化秩序。

儒家思想固然是一种古老文化，根基深厚、稳固，但同时也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传统。她召唤我们：投身、贡献！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儒家思想发源山东，曲阜为策源地，堪称儒家之“耶路撒冷”圣地。而今天，儒家思想所到之处，其影响、其责任，已延伸至全球，成为整个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我们在当今，须笃行《大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值世界儒学大会开幕之际，在世界承认与拥抱儒家思想国际价值场合，将这份荣誉赋予我，对我充满深刻意义。我，现生活在一个亟需儒家思想哺育的世界，真诚祝愿：本次大会精心计划的议程，及其在对儒学历史贡献方面，获得圆满成功！

安乐哲

2013 年 9 月 27 日

弁言



2013年11月26日，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值得永远记取的日子。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发出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这里，正是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地。

习近平主席视察孔子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进一步坚定而自信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了构建时代新文化的步伐。

在视察曲阜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多次就传统文化发表讲话，并站在世界文明与国际关系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思想”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义，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不止一次地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的那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此言正深度契合孔子儒学思想的精髓。

中国先人早就看到“人心惟危”，人不能“好恶无节”，要明理修身，推衍亲情，放大善性，“允执厥中”。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又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既然“有度”与“无度”全在“人之思想”，那么，中华文明“以礼制中”的意义便不言而喻。

中国儒学是在继承孔子以前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气质与特征。春秋时期就有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儒家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主张，虽不苟同，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世界文明多姿多样，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与相互尊重、互鉴而

相互包容，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进而求同存异，互相涵摄，和谐相处，共同前行。所以，大力宣传孔子儒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建立民众共同价值信仰体系的需要，而且正符合世界的需要与时代主题。如果能将孔子儒学精髓更好地传承下去进而传播出去，这将是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礼物。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即通常所谓“原始儒学阶段”，这是儒学创立时期；二是秦汉以来至近代以前，这是“帝制中国时代”，是儒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结合的时期，可概略称为“儒学发展阶段”；三是近代以来，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这可称为“儒学反思阶段”或者“儒学反省阶段”。

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作为思想文化，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这已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时间虽然过去两千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人们仍然必须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

人们之所以对儒学认识存在分歧，原因很多。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时代，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儒学是统治学说，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这种“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但仍然有人看到孔子与后儒的不同，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和传统，主张分清“真”“假”孔子。如李大钊说：“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灵魂也。”

随着学术的进步，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在儒学“创立”时期，儒家思想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早期儒家强调“正名”，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汉代以后则有不同，适应专制政治制度的需要，逐渐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慢慢蜕变，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

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原来，强烈“保守”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而对孔子儒学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专制政治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难怪“新启蒙运动时期”有学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们确实更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们应当感谢世界儒学大会，感谢“孔子文化奖”的设立，她对于推动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07年举办发起国际会议以来，世界儒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六届七次。先后有二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一千一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八百余篇，出版了六部学术论文集。经过八年多的建设，世界儒学大会在国内、国际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成为汇聚海内外儒学研究权威机构、知名学者以及各界人士的全球性儒学盛会，搭建了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国际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并成长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

从2009年开始，每届世界儒学大会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盛典，这就是颁发“孔子文化奖”。该奖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设立的我国儒学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最高奖，旨在表彰鼓励世界各地为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孔子文化奖”的学者和机构，2009年度为杜维明先生和孔子基金会，2010年度为庞朴先生和国际儒学联合会，2011年度为汤一介先生和汤恩佳先生，2012年度为牟钟鉴先生和韩国成均馆，2013年度为李学勤先生和安乐哲先生。

为保证“孔子文化奖”的公正性、神圣性，“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制定了科学严密的推选程序。从推选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到具体的推选实施方案；从推选委员独立匿名提名，到汇总后再次提请推选委员进行选举，都十分严谨、公正、细致，这是对“孔子文化奖”的尊重，更是对“孔子文化”的敬重。因此，每一次“孔子文化奖”颁奖，都成为人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

可以说，每一位“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都立足于学术前沿，深刻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他们之中，有的着力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显扬

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有的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发中华智慧；有的用心考察儒、释、道三家，以独到的见解丰富深化儒学认知；有的笃行儒道，胸怀天下，在弘扬孔子文化和推广儒道上不遗余力；有的探源古代文明，解读早期中华文化的高度与深度，彰显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的广阔舞台；也有毕生钟情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儒者，以比较的视野阐发儒学的价值，向全世界介绍儒家学说。这些获奖学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获得孔子文化奖乃众望所归。

为了更好地展示“孔子文化奖”获奖学者的风采与成就，回顾和宣传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孔子文化奖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下，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组织选编了这套“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这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儒学大会，了解“孔子文化奖”。

本次出版的是前五届获奖学者的学术文粹。以后随着世界儒学大会的继续举行，随着新的“孔子文化奖”获奖者的产生，该“文粹”还会继续编辑下去。

世界儒学大会执行秘书长 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

2015年8月5日

自序



活着的中国哲学

我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学习要从很多年前说起。写作永远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先父曾创作过一些推理故事，我兄长则终生教授英语文学，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写了很多诗。为了能与这代人中的精英们一起学习，我离开了温哥华舒适的家，远赴美国南加州雷德兰兹（Redlands）大学的文理学院求学。我的写作激情得到了很好的激发。雷德兰兹的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妙的人生经历，至今，我仍非常感激雷德兰兹大学通过交换生项目把我送到了香港学习。

1966年夏天的一个闷热的傍晚，十八岁的我孤身一人来到了香港，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陌生，不同的景色，不同的肤色，不一样的味道。初到中国的这个夜晚，从尖沙咀弥顿道上小旅店的窗户向外望，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短暂的生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那时，年轻的我追求强烈情感和极度冒险，想借此书写充满生命力的诗歌。我在雷德兰兹大学研修西方哲学，与数个世纪以来无数的学生一样，很快从苏格拉底的真诚及其“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探索中得到了启发。到香港之后，我又学习了儒家哲学，它与苏格拉底的自我发现之旅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也可能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我开始痴迷于儒家的美学观念——“修身”“弘道”，最后“平天下”。那年夏天，我在九龙的新亚书院学习中文，从而有机会聆听几位中国现当代杰出哲学家的教诲，特别是唐君毅先生（1909—1978）和牟宗三先生（1909—1995），他们坚信中华传统文化在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屈辱和磨难后，依然有持久的力量。夏末的新学年，我转入新界沙田的崇基学院，有幸跟随劳思光教授（1927—2012）学习孟子。劳教授对研究



的全心投入和对哲学的热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印象深刻。

当时香港非常贫穷。对我们学生来说，米饭中常常有砂子，粥里的米又少得可怜。但那时仍有年轻的教授开设令人兴奋的课程；也在那时我与同窗师友结下长达几十年的友谊。后来，香港发生了排外骚乱，我和年轻的朋友们好几夜困在同学家里，担心走到街上会有危险，他们对我关怀备至。如果说我从课堂和书本上学到了一点中国哲学，那么我从一群与我当时熟悉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了更多。不断增进的关爱之情，让我真实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1967年夏天，我这个“年轻”人更成熟了，站在“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甲板上，手捧着刘殿爵（1921—2010）翻译的《道德经》，回望渐渐远去的香港灯火，开始了回乡的旅程，经过旧金山，最后回到加拿大。此时我已经是—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生了。

从进入雷德兰兹大学算起，我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完成博士学位。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当时西方哲学系不开设中国哲学课程，时至今日，多半西方大学的哲学系依然如此。作为—门专业学科，西方哲学仍援引地缘标准而非哲学标准，试图让自己和全世界相信哲学是盎格鲁—欧洲的“专利”。这种“盎格鲁—欧洲圈之外的文化不热衷寻求智慧”的隐性假设是违背常理的。在香港生活和学习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这种假设既狭隘又拙劣，此后更加致力于挑战这种带有深厚民族优越感的西方哲学传统。

为了能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我必须在五年内拿到中文和哲学两个学士学位。攻读硕士学位时，情况也是如此。我来到台湾大学哲学系，花了两年时间做课程论文，也因此有机会受教于方东美先生（1899—1977）。1972年，我从台湾返回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三年硕士课程，但是在亚洲研究系，而不是哲学系。

在台大，我震惊地认识到哲学的世界地位。以欧洲哲学为主导的西方哲学长期占据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的主流课程。这一现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西方的傲慢，其他地区文化的自我殖民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这种对哲学专业的自我理解，无论在东方的台北、东京、首尔、北京、德里，还是在西方的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巴黎—样都是真实的。亚洲本土的哲学家在国际

上遭受冷遇，在其本国文化中同样被严重边缘化。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在苏格兰爱丁堡做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时是这样开场的：“欧洲人说，我们（美国人）听，这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① 如果他在美国人后面再加上亚洲哲学家一起作为英国和欧洲哲学的听众也是没错的。这种状况在 1901 年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没有丝毫改变。

我在日本的亚洲研究系又学习了两年中国哲学后，终于进入伦敦大学跟随哲学家研修中国哲学。正是在伦敦大学，我有机会受业于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哲学经典翻译家刘殿爵先生（D. C. Lau）。刘教授坚信我们必须回到原典中去，从文本出发进行研究。这对我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最大影响。刘教授自始至终反对那种漂浮在哲学文献上的二手学术讨论。在我上课的第一天，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了几遍《淮南子》？”我的回答显然不能让他满意，他失望地说：“一共就这些？”苦笑着指了指图书馆。博士毕业后的很多个夏天，我都会来到香港刘教授堆满书籍的书房，与他一起研读《淮南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当好老师。多年来，我们一起潜心研究《淮南子》的首卷，也是其中最重要篇章之一的《原道》。我们合作翻译了当时新发现的有“第二部《孙子兵法》”之称的《孙臆兵法》。^②

在伦敦亚非学院图书馆我结识了葛瑞汉（Angus Graham, 1919—1991），随后的几年里，他到我供职的夏威夷大学做客座教授，使我还有机会向他请教。葛瑞汉坚持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所提倡的“关联式思维”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特征。

1978 年完成伦敦大学的学业后，幸得刘殿爵先生推荐，我来到夏威夷大学哲学系任教。夏威夷大学是当时西方国家中仅有开设中国、日本、印度、佛教和伊斯兰教哲学课程的大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都是独一无二的。20 世纪 30 年代，陈荣捷（1901—1994）担任该系的第一任

①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对人性的研究》（*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马里兰州罗克韦尔：马诺（Manor）图书，2008 年，第 11 页。

② 《孙臆兵法》（*Sun Bin: The Art of Warfare*），刘殿爵、安乐哲译，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系主任。他和研究南亚哲学的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 1901—1994）共同创立了一个关于世界哲学的综合项目。该项目认为，在西方哲学系研究非西方哲学的学生，要比那些仅限于宗教或亚洲研究领域的学生更具有优势。接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生通常会从另一全新的角度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比较训练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优势，并不是因为西方哲学具有中国传统缺少的优秀哲学思维所需或必需的“精确性”，而是因为比较哲学的集成性和扩张性很有用，能够提供另一种有利视角。中国哲学的宏大又能让学生超越西方技术和观念，开阔他们的视野。中国有这样的说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与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的看法不谋而合：“只知英国者不知英国。”

比较哲学的优势是双向的，但很多西方哲学家没有认识到这点。运用非西方文化中的不同语言和不同范畴来研究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举例来说，在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威廉·詹姆斯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西方哲学脉络中，“过程思考”（process thinking）还是相对比较新的概念。而中国的第一部哲学经典《易经》就记载了中国传统的“气宇宙学”（qi-cosmology）所表现的“过程世界观”。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作为对“物质本体论”内部批评的一种主要方向，西方学界对“过程哲学”逐渐感兴趣。这种兴趣随着对中国成熟的过程感知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而进一步提高。当我徘徊于中国思想研究之门时，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学术研究伙伴郝大维（David Hall, 1937—2001）。郝大维当时正努力超越怀特海对永恒客体及上帝原初本性的认识，希望在过程思考中探求更多一致性。对所谓“另类”文化的更准确表述应该是补充和互补资源。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西方哲学仍然排外，就将抱残守缺。

供职夏威夷大学不久，我就开始与郝大维进行专业合作，先后共同出版了六本著作，先出版了阐释性研究论著，然后又推出了几部经典的哲学翻译作品。虽然不那么完美，但这持续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郝安合作”仍不失为一种快乐持久的尝试。我们综合运用文献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阐释研究，然后再把这一阐释背景应用到原典的哲学翻译中去。